

# 中国共产党 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 和发展中的作用

王福琨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 中国共产党 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 和发展中的作用

王福琨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王福琨主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219-05742-1

I.中… II.王… III.中国共产党—作用—抗日战争—文化史—研究—桂林市  
IV.K2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89141号

总策划 张华斌 江 淳  
项目策划 李筱茜  
责任编辑 张华斌 夏 源 李克平  
责任校对 周月华 张聘梅  
装帧设计 雅泰书装

---

## 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王福琨 主编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 960毫米×650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9-05742-1/K·1113

定价: 26.00元

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科普读物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庞汉生

副主任 庞隆昌 许家康 张瑞枝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许家康 刘翠芳 张瑞枝

庞汉生 庞隆昌 曹平



《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编撰人员

主编 王福琨

执行主编 邓群

副主编 姚蓝 韦秀康 樊东方 刘绍卫

撰稿人员 王福琨 邓群 姚蓝

韦秀康 樊东方 刘绍卫

张丽红 黄莺 阙伟光

莫细细 刘琳

# 序

抗战文化运动是对日本全面侵略吞并中国的文化应对，它秉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深沉的思想呐喊，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以强烈的民族和革命担当精神，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血与火的军事战线相互呼应，以浴火重生的文化创造激情，谱写了一曲曲抗战文化壮歌，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抗战文化。广大文化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下，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文化活动，掀起一股时代文化创造的热潮。抗战文艺应运而生，它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成为唤醒民众的文化号角，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汇成了气势恢弘的抗战文化热潮。抗战初期，虽然上海、武汉等抗战文化中心沦陷，但桂林、重庆、昆明、成都等地却迅速出现新的抗战文化中心，使抗战文化呈星火燎原之势；敌后抗战文化据点星罗棋布，全民族空前觉醒，铸造了“中华民族之魂”的“抗战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抗战文化是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桂林文人荟萃，书店和出版社林立，图书、报刊的出版空前繁荣，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创造了大量抗日文化精神产品，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内涵，是当年中国抗战文化精粹的总汇，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桂林因此被誉为“桂林文化城”，它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

史、艺术史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史都密切相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并占据重要的地位。

活跃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为桂林抗战文化提供了先进的思想理论，而且以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和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资源的融合者。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提升了桂林抗战文化的精神气象，有力地调动了旅桂文化人的民族责任感和文化创造激情，使他们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以超常的人格精神魅力，凝聚几千年来爱国主义文化精粹，构建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抗战文化运动。对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桂林抗战文学史》、《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等专著的出版，填补了学术上的一些空白，但从意识形态角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更深刻地解读桂林抗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则还有待于加强研究力度。《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的出版，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加强党对掌握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认识和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 目 录

- 1 || 绪 论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牢牢掌握先进抗战文化思想的领导权
  
- 13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桂林抗战文化的领导
  
- 15 || 第一节 桂林抗战文化城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内蕴
- 22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组织领导
- 32 || 第三节 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和丰富的理论文化资源
- 41 || 第四节 整合了各阶级各阶层“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
- 51 || 第五节 树立起先进的抗战文化旗帜
- 57 || 第六节 中国共产党是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核心
  
- 67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 67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 82 || 第二节 周恩来与桂林抗战文化城
- 102 || 第三节 杨东莼与桂林抗战文化城
  
- 128 || 第三章 桂林抗战文化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 129 || 第一节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兴起
- 138 || 第二节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历史贡献
- 158 || 第三节 桂林抗战文化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
- 163 || 第四节 桂林抗战文化在全国抗战中的作用
- 
- 170 || 第四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意识形态斗争
- 
- 170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城实现文化领导权
- 187 || 第二节 桂林抗战文化对人民思想的引导作用
- 197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文化城的党建思想
- 208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桂系抗战时期进步性的推动作用
- 217 ||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国际化
- 
- 227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统战工作
- 
- 227 || 第一节 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统战工作
- 243 || 第二节 对桂系进行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
- 
- 255 || 第六章 桂林抗战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建设



255	第一节 桂林抗战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建设
261	第二节 桂林抗战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意义和作用
267	第三节 桂林抗战文化精神的现实启示
285	后 记

# 绪论

##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牢牢 掌握先进抗战文化思想的领导权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概念及其含义

桂林抗战文化中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许多狭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而狭义文化，仅指文学艺术形式，是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论文、资料、回忆录和《桂林文化城》电视文献纪录片中，一般都把桂林抗战文化局限于文化名人在桂林所进行的文学和艺术形式的活动。并且认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在1938—1944年的六年间，一千多位知名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学者的文艺活动是其显著特点；文学、艺术以外的其他活

动，如党的活动、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群众的和中小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广西组建三届广西学生军和各地战时工作团的抗日救亡运动等则未见记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38年秋的文艺活动，以及文艺以外的文化思想的其他活动，亦未见记述。1986年南方局党史资料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许涤新同志在会上认为只记述文艺形式活动是不够的；在1989年“七九”事件四十七周年纪念会议上，陈岸、庄炎林、黄嘉、黄耿等19位老同志在座谈对桂林抗战文化的电视文献记录片的观感时，也认为仅仅记录1938—1944年间文化名人的文艺活动，与文化城的历史发展和名称不完全相符，人为地将桂林广义的抗战文化城缩小为狭义“文艺城”了。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且将广义文化称为大文化，将狭义文化称为小文化。大、小文化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1）大文化涵盖着许多形式的小文化。（2）大文化，尤其是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是小文化的理论基础，并决定着小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谈论桂林文化城的文艺，就不能不谈其与广义文化，尤其是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联系。而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和抗日文化，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便在桂林开始传播了，不是1938年大批文化名人到桂林才传播的。

## 二、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和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sup>①</sup>桂林文化城的文化，正是属于毛泽东指出的“今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中，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便逐渐产生的。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桂林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抗日救亡运动产生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史学界、文化界（包括文艺界）普遍地认为，大致上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为萌发时期，这是第一阶段；“一二·九”运动至1937年七七事变为奠基时期，这是第二阶段；七七事变至1938年武汉沦陷为大勃兴时期，这是第三阶段；武汉沦陷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为成熟时期，这是第四阶段。

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桂林抗日救亡运动，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传播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对桂系首脑、桂系民主派和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以及科技各界进步文化人，发挥思想领导的作用。二是通过各基层党组织的广大共产党员的努力，发挥组织领导的作用。因此，桂林抗战文化存在的时间，应与中国的全面抗战同步，从1937年7月开始，到1945年9月结束。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的十四年间，党组织在桂林通过“三校”（指广西师专、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和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一会”（指广西建设研究会）和“三军”（指第一、第二、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基层党组织以及广大党员，开展共产主义和进步文化思想理论宣传和统战工作，实现对桂林文化城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

1. 抗日救亡运动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广西师专党组织（1936年10月成立）、共产党员以及进步文化人士在校内外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为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和准备了干部条件。1932年1月，新桂系筹办广西师专，并于当年10月12日正式开学。刘斐、李任仁和李宗仁、白崇禧先后信邀和电邀杨东莼出任师专校长。杨东莼又聘请朱笃一任教务长。朱笃一原名朱克靖，中共党员，北伐时为国民党第三军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外又聘中共党员、经济学者薛暮桥等讲授社会发展史、唯

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这一类进步文化思想理论课程。为了公开、合法地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学校主张各种学术思想都可以研究，但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方面，提倡读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和关心国家大事，从而引导学生研究进步文化思想，使之指导行动。

第一，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解剖社会现实问题。这是批判旧思想、旧社会的锐利思想武器。1934年夏，薛暮桥带领学生刘敦安等到广西各地调查。他们特地走访龙州起义地区的下冻区和水口乡（靠近中越边界），以取得第一手农村经济资料。通过调查，学生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进而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过程中，1934年4月，由于有人告密，师专这种倾向于进步文化思想的教学活动，引起桂系当局的注意，同时，白崇禧也发现了朱笃一就是北伐军第三军党代表的朱克靖。朱克靖因此于1934年被“礼送”出境。不久，杨东莼、薛暮桥也被迫辞职。

第二，广西师专学生自觉担负起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责任。1934年夏前后，朱克靖、杨东莼、薛暮桥虽然走了，师专的进步文化思想和进步势力仍然占据上风。因为1935年9月，李任仁又引荐进步学者陈此生任教务长，陈此生又聘进步学者陈望道（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译者）、马哲民、邓初民、熊得山、夏征农、杨潮（羊枣）、沈西苓、施复亮（中共党组织的筹建人之一）等中共党员、进步学者任教，继续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理论。1935年10月，陈望道在他的演讲稿《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发表在校刊《月牙》上）中指出师专“能否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并不在乎人数的多少，而是在乎我们提倡的文化内容是否适合大众的需要。”只要“我们处处都不要忘记了大众，要使我们的理论成为大众所需要的理论。这样，我们才能够负起西南以至整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责任”。当年，广西师专进步师生自觉地担负起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责任，自觉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陈望道、陈此生的倡导、支持下成立“广西

师专剧团”，于1936年1月和4月，在桂林先后举行了两次盛大的话剧公演。演出日本菊池宽的《父归》、欧阳予倩的《屏风后》和苏联剧《怒吼吧，中国！》、《巡按》，先后由祝秀侠、沈西苓导演，杨潮、邓初民、夏征农、彭仲文分饰剧中角色。林志仪在《陈望道先生在桂林》一文中认为，广西师专剧团的演出，是“广西话剧运动的起点，这两次公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桂林以至广西的话剧运动”。师专进步师生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传播进步文化思想理论的责任，于1935年10月，在杨潮的指导下，陶保桓将师专和桂林各中学的反托斗争骨干组织起来，定名为“反帝反法西斯同盟”。1936年2月16日，杨潮在校刊《月牙》上发表《现阶段学生运动的检讨》，介绍平津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的收获，指出人民大众“被唤醒了”，运动的性质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爱国情绪的反映，是整个中华民族统一的神圣自卫战争的前哨战”。师专学生在这一思想认识基础上，将反帝反法西斯同盟改为“抗日反法西斯同盟”。1936年10月，广西师专在改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时成立中共支部，接着组建中共桂林县委。文法学院党支部又将桂林高中、桂林女中经过考验的抗日反法西斯盟员吸收入党。这些历史事实，说明桂林文化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已有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基础和抗日统一战线文化思想基础。夏衍在《记〈救亡日报〉在桂林》一文中曾提到桂林文化城是有基础的。他说：“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一般说来把桂林叫做文化城，看来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广西在我们到来之前，文化、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进步力量都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广西文化界元老李任仁先生为主任的一个颇有声势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实际上，夏衍所说的“在我们到来之前”，远不仅止于广西建设研究会，还应上溯到1932年10月时成立的广西师专。因为从1932年10月至第一次反共高潮这八年时间内，杨东莼、陈望道、邓初民、熊得山、施复亮、沈西苓以及广西大学的千家驹、李达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已在桂林为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在第一次反共高潮

前后，则与后来桂林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一起，在桂林为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再作贡献。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几百名广西师专学生，如陶保桓、杨江、路璋、路璠、区镇、汤有雁、张景宁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于1939年成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党校的干部，是桂林文化城的骨干力量。

2. 在抗日救亡运动第四阶段，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干校）继承广西师专的光荣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奠定更为深厚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基础并培养了更多的骨干力量。干校创办于1939年3月，1940年12月结束。1939年初，杨东莼从湖南撤到桂林，原已决定去延安，但黄旭初两次邀请他出任干校教育长。杨东莼请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经反复考虑，党组织同意杨东莼接受桂系聘请，并把干校办成“南方抗大”。干校在研究自由的名义下，实际继续广西师专的做法，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理论，有些不好公开宣传的问题，就在个别谈话时进行。干校共吸收一百余名中共党员做干部和学员，其中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中共广西省工委输送的有秦柳芳、宋之光、周钢鸣、苏蔓等三十余人。干校除行政干部外，聘有七八十人的小组指导员，其中约有半数为广西师专学生担任。干校共招生四期，训练学员一千四百余人，发展了一批党员。在杨东莼的领导下，干校有外来党员支部和本地党员支部，支部书记分别为周钢鸣和张海鳌。外来党员支部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本地支部由广西的党组织领导，两个支部不发生横的关系。干校教学课程和活动，既讲三民主义和桂系“三自”、“三寓”、“行新政用新人”，也讲科学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理论，干校的文化学术讨论会、时事形势报告会和时事座谈会经常举行，搞得热火朝天。据当年在干校工作过的汤有雁同志的文章《“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回顾》一文介绍，到干校参加国际国内时事座谈、演讲和作政治军事形势报告的政要名人有叶剑英、徐特立、李宗仁、李任仁、方振武、沈钧儒等四十余人次。中外知名人士和国民党官员以及文化团队、学校学生到干校参观也不少，如陈嘉庚、美国记者爱泼斯坦、美国人丁尼留、蒋经国、黄绍竑

（时任浙省主席）、严立三（时任鄂省主席）、孟寿椿（时任教育部参事）、梁秉坤（时任内政部专员）、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朝鲜东方战友社等。干校在党和杨东莼教育长的领导下，牢牢地占领了这个传播进步文化思想理论阵地，紧紧地掌握着文化思想领导权，对团结桂系民主派、桂林进步文化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样，就把桂系出钱办的干校，变成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和西南大后方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据点之一，从而使之成为桂林文化城的重要支柱。

3. 抗日救亡运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广西建设研究会是中共在桂林的“真正统一战线的组织”。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10月，至1944年8月结束。该会的成立，陈劭先在《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和结束》一文中披露：“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反蒋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组织。”这个会贯彻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策略，“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李济深后来是名誉会长。桂系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几乎都是会员。中共地下党员谢和赓于1934年打入桂系，也是会员，他以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身份，负责桂系与文化界人士的联系。中共引荐了夏衍、胡愈之、范长江、金仲华、李四光、陈翰笙、阳翰笙、杨东莼、李达、千家驹、欧阳予倩、陈此生、莫乃群（以上人员中的前六人是七七事变前已在广西工作的）等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为研究员。黄同仇是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书记长，是该会的常务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主持桂林“清党”）。黄同仇曾攻击陈此生和千家驹，但其阴谋不得逞，便不管会务，后来投靠CC（即中央俱乐部）并去安徽做官。所以研究会实际上是由李任仁、陈劭先决定一切大小事情。从研究会的组织目的、人员组成和各种活动内容来看，进步文化思想宣传是主要的倾向，中国共产党通过该会和以李济深为中介，充分发挥了这个会的“真正统一战线的组织”作用。为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抗日救亡运动第二阶段中期、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初期，先



后成立的第一、第二、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和桂林的学生运动，是传播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并发挥其文化领导权作用的基层骨干力量（这一点在许多有关桂林文化城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中共地下党员谢和赓向白崇禧建议组织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反蒋防奸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桂系以广西大学文法学院两个毕业班为主，吸收其他学校学生成立第二届广西学生军。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桂系成立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组建三个团四千余人。以上三届广西学生军的成立，诚如黄嘉同志在《论广西学生军》一文中所说，是蒋桂矛盾消长和浮沉的产物，是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迫切要求逼出来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出来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十分重视第三届学生军，当时全省共产党员不足千人，动员了约10%的党员参加学生军，决定党员在学生军中的任务：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团结进步群众，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全民抗战主张和持久战战略思想，在桂林以至全省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这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桂系参加抗日，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 抗日救亡运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中，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和掌握的革命据点，在八年抗战全过程中，该校以整体规模发动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文化运动、抗日文艺运动。在桂林沦陷期间，先后组织“桂师暑期抗日宣传队”、“桂师战时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当时活跃在桂林东北的临阳联队，灵川、全灌等抗日游击队伍，都是以桂师学生为领导骨干的。该校存在十一年（1938—1949）中，招收学生九百多名，就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有四十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桂林文化城中国统区的一所普通中级师范学校，有如此鲜明的革命倾向，为八年抗战、为民主革命作出如此卓著的战斗业绩，在广西以至国统区内是罕见的。